

僭越与时尚:洋布在晚清的社会活性

刘玉琪

(北京服装学院,北京 100029)

摘要:[研究意义]中国传统服饰习俗有两方面,一方面以小农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方式为基础;另一方面是以朝廷颁布的服制形成礼制,在民间形成习俗以规定臣民。而在晚清时的中国,由于通商口岸的开放,西洋纺织品进入中国,对传统中国“土布”市场带来冲击。[研究方法和内容]本文选择洋布在中国的发展的脉络为视角,论述晚清洋布发展对中国服饰礼制和习俗的影响,探讨由洋布而引起的在晚清时的社会阶层关系与时代风尚。

关键词:洋布;通商 服饰;时尚;阶层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2095-4131-(2019)04-0032-05

Arrogation and fashion: calico's social activit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IU Yu-qi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Chinese traditional dressing custom has two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it's based on the natural economy of family autarky. On the other hand, it's influenced by the dressing system issued by the cour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due to the opening of trading ports, the influx of western textiles into China had a great impact 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loth' marke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lico's development in China as well as its impact on Chinese clothing etiquette and customs,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social class relations and fashion caused by calico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words: calico; trade; clothing; fashion; class

1 洋布衣的流行与普及

18世纪中期欧美发生工业革命后,自英国产生的纺织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增速最快的是纺织业。洋布,源于西洋,是开口通商后由西方引入中国的纺织品,通常指棉布,与传统中国手工的“土布”有显著不同,故称之为洋布。在鸦片战争后几十年间,各国输入中国的纺织品

随着中国开口通商城市的增加与商品输入量的增加也持续增长,尤其是棉织品数量的增幅最为明显。从1842年之后,进口到中国的货物中,棉纺织品仅次于鸦片和棉花,到1867年超过鸦片数额居第二位,占21%;再至1885年,棉织品就以占35.7%的优势成为进口物品的第一位,并保持这种趋势持续到20世纪初^[1]。

收稿日期:2019-04-03;修回日期:2019-07-30

基金项目:教育部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NHFZ20180120)

通信作者:刘玉琪,北京服装学院博士生

所以,在进口纺织品中,棉织品亦即洋布是占比最大的一项,尤其是在19世纪80年代后增长幅度最大。另外还有一项专门对洋布输入量的统计,1867年是425万匹,1880年增为1,316万匹。13年增长了2倍。1890年增为1,656万匹^[2]。从这样的数据可以看出,晚清中国洋布进口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进口的洋布之中,毛织品又因其价格高昂,成了一些有钱的上层人为了追逐时髦且为了实现夸耀性消费的奢侈品,而棉布的价格比传统土布更为低廉,西方为了在中国大肆倾销纺织品数量,所制作的洋布比传统中国手工织布更为细密平滑,色泽鲜艳,且美观实用,随着技术的不断改进,价格也逐渐降低,有记载,“通商后的19世纪50年代降为3两。”^{[2]1368}还有记载,“在1834~1849年间,进口棉布每匹价格由4.75元下降到2.4元,洋布的这种价格已经与传统土布较为一致。”^[3]在19世纪50年代末,洋布由于进口过量,形成滞销,价格进一步下降,有记载说,在天津市场上的售价,已经低于土布的三分之一,而在1861年时,甚至“仅及土布价钱的一半。”^{[3]180}洋布价格的下降,使得更多的人有能力去消费,更带动了其销售额的增长。

洋布的销量增加进而带来的是销售区域的扩大。最先影响到的地区属于通商口岸的城市,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是最早的等五口通商口岸,19世纪60年代以后,天津、镇江、牛庄、汉口、九江、登州、宜昌、芜湖、温州、重庆等各主要交通枢纽城市也逐渐被开埠。这些商埠都成了外国商船自由往来、进出口货品集散流通和中外商人来往聚集之地。与此同时,作为中外贸易商品大宗的洋布,从开口通商的城市,逐渐扩散至更广大的内地城乡。

从通商城市到内地城乡,扩散的地域范围不断增加,19世纪80~90年代以后,洋布已经扩及到广大内地,形成了全国性的洋布畅销态势。正如郑观应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对洋布

流行的描述:“自洋纱、洋布进口,华人贪其价廉质美,相率购用……迄今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八九。”^[4]洋布成为城镇居民中日常生活选择衣料的一部分。甚至是在一些偏远地区,居住在城镇的人们也乐于穿上洋布衣,如贵州桐梓县,原来多用土布及自织布,后来则洋布盛行:“早年服丝绸者,百之一二,本地棉麻,亦足敷用。自洋布盛行,城市服者十九。”又如广西贵县:“清光绪中叶以前,衣料多用土货,县属比户防止,一丝一缕,多由自给。光绪季年,衣料浸尚洋货,即线缕巾带之微,亦多仰给外人。”^[5]当局统治者为防止白银外流,于19世纪90年代在国内建立织布厂,如最早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湖北机器织布局,并开始自行生产机织布匹。随后,各地商人也自行开办机器织布厂,全国随即展开了开办织布厂的热潮。至此,民间俗称的“洋布”,不再只是进口外来的纺织品,而是对新型机器所制造出来的布匹的统称。随着中国本土机织业的不断发展,由于工价低、运费省等,成本和价格比舶来品更低,更容易被中下层人所接受,再一次掀起了民间洋布的使用高潮。

洋布的流行特点是随着市场扩展,即哪里有布料市场,哪里就会出现洋布取代土布的过程。毕竟在市场上,洋布物美价廉,同等价格下土布粗糙且美观性差,因此很难可以和洋布竞争,民国初年以后,全国各地布料市场,大部分已经被洋布所占领。然而,各地人们穿用洋布与土布的比例,则因各地经济和交通状况而稍有差异,经济和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洋布比例较高,反之则土布比例较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20世纪中期。而在19世纪末流行起来的着洋布衣的风尚,在近代社会生活中又产生了新的文化意义。

2 洋布与服饰僭越之风

传统中国服饰中,人们的衣着服饰不仅具有遮体御寒的实用功能,还有外在身份地位的

象征作用。各个时期的服饰方式都有浓重的政治礼法和道德礼俗色彩,历朝统治者在取得统治权位后,都会制定服制,颁行天下,用以宣示统治的权威,规范官与民,贵与贱的上下尊卑等级秩序。一旦江山易主,变服制、易服色即成为首要的举措之一,清朝自建立政权后,以严刑酷法强令百姓接受满族服饰方式,以作为征服汉民、建立统治秩序的重要举措,并且十分注意防范汉人,并把服制作为区别尊卑上下的重要制度。

由于洋布的价格低廉,它迅速侵占了传统土布的市场。传统社会中,人们可以通过布料的装饰、颜色、质地来辨别社会身份,但是洋布的流行使社会大众多了一种选择,这种选择降低了人群中社会身份的辨识度。昂贵的皮毛、绫罗绸缎的服饰原先只有社会上层人士来穿着,但洋布的效果也可以达成昂贵布料的美观性,这就给中产阶级人士创造了新的消费空间,这一部分群体具有购买能力,但是又不足以可选择昂贵质地布匹作为日常消费品,所在洋布未流行之前只能选择土布来使用。也就是说,由于洋布在中层人士群体中的广泛使用,它使服饰的象征作用减弱,进而传统礼制的服饰等级制度也在逐渐消除。特别是那些从事非体力劳动的小商小贩、贩房店伙、塾师医卜等人便改穿洋布,显得比穿土布更时髦体面,同时也与穿土布的体力劳动者身份有所区别^[6]。到了19世纪70年代以后,可以说城镇居民以中等阶层为主,在中上层与中下层的百姓日常服饰中,洋布已经成为一种主要衣料。在多数已开放通商的城市,人口密度逐渐大,对新式职业的需求也随之增多,如银行职员、学校教员、商店售货员等新兴职业的从业人员多选用洋布质地来做成日常衣装;更多的未通商城市中富裕人口占比较少,稍有经济资本的也会选用洋布衣装。所以,穿洋布衣就成为了社会中层人士的服饰象征,在某一程度上又符合了传统礼制下的等级秩序:着皮毛绫罗绸缎代表社

会上层人士,洋布衣装代表社会中层群体,穿传统土布是社会底层大众的选择。

洋布在国内的普及,使清廷服制规定的依身份而穿的质料和颜色也出现混乱穿用的现象。以往服制规定庶民百姓不许穿用貂皮、狐皮、狍狸皮以及绣缎等高档材料,并禁止使用明黄、大红、香色、米色等服色。但随着洋布在国内的不断发展,大量的洋布倾销使人们在服饰服色上与实际身份相错位,出现了混乱僭用的现象,甚至连商贩、仆役都可穿着“艳福华冠”如绅官,在以往会被视为是违背礼制的行为,但在晚清却成了无所顾忌、司空见惯的现象。尤其是集中在城市中的中上等人士之家,他们选择洋布来替代之前无能力购买的毛皮绸缎,保留体面的同时还减少了花费。这种在服饰上弱化上下级等级意识的社会行为,使社会中层人士得以通过表面的“尊贵”向上层阶级靠拢,更加剧了传统衣着礼俗上下等级意识的弱化。

3 洋布与服饰时尚化

但是,正是由于洋布在社会中的广泛使用才得以促进中国近代服饰的时尚历程。传统社会中能够经常置换服装的只集中在社会上层人士之家,中下层人士日常的服饰以土布为主,又因其颜色质地单一,很难创造出某一阶段的社会时尚。而洋布的引入减轻了人们日常衣料购置的经济负担,它低廉的价格和多样的色彩、款式让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洋布并不具备传统土布的耐磨性也就有了一定的更换周期。这样,在洋布被群众接纳的过程中也创造了人们对日常衣装的新习惯——有更多可替换的衣服。因此,洋布的流行就促成了以式样和颜色频繁更新的服饰时尚,正如清末北京竹枝词中“印花洋布制精奇,颜色鲜明价又低。可惜一冬穿未罢,浑身如蒜拌茄泥。”

此外,洋布所带来的不仅仅只是衣服,还有各色各样用洋布做的小布品饰物如洋袜、洋巾、洋手绢、洋花边等也成了流行时尚。同衣服

相比,小布品的物件更新速度更快,这更加促进了人们对衣式时尚的追逐——稍有余资,就可以时常翻新、赶时髦、追时尚,从而使人们衣式消费方式更活跃,丰富了市民生活的色彩和节奏。

洋布带来的洋式装扮风气的扩展,一是在地域上发生变化,在通商城市流行更广,并扩展到其他内地城市,流行地域日益扩大;二是社会阶层原来多在商人阶层及其子弟中流行,而到这时在青年学生、新派人物、回国留学生、青年子弟等学界、政界、商界日益流行。但是在20世纪之前,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这被认为是崇洋忘祖、以夷变夏,丧失廉耻的行为,其主流社会的政治和道德层面的评价也是倾向消极,在整个社会文化大结构中,还是以传统为主导,因而服饰西洋风在社会主流舆论中处于被批评排斥的地位。

但是,在20世纪初期清廷开始实行新政、仿效西法、引进西学后,社会上下学习西方风气大盛行,“西洋”瞬间变成了文明、进步、富强、先进等一系列正面的社会文化意义符号。洋布衣的服饰装扮不再是商业上优势的意义,而成了文明开化的符号,具有政治道德的合法性,且具有正面的社会文化意义。一些回国留学生的西洋装扮也成为人们羡慕的时髦,各地城市青年学生、新派人物、青年子弟等也竞相效仿。同时,洋货进口增多,倾销于广大内地,国内也开始兴办仿造洋货的制造厂,可以制造如毛巾、机织袜等西式服饰国货,而且数量逐渐增多,价格也较为低廉,为洋式饰物的大规模流行提供了物质条件,特别是后来从西洋引进的透明轻薄的丝袜,更加美观,时髦女郎以穿着此为时尚。

洋布带来的服饰时尚,代表着西化、新派、文明等正面社会价值,其所标示的社会意义、社会地位与经济能力日益融合,反映了西方文化在社会中日益强势的地位。服饰西洋化的风气也由以往处于社会下层的商人阶层,扩展到

社会名流、新派人物、留学生、新学青年等精英阶层和社会中上层。他们以西洋服饰为时尚,强化了所蕴含的文明、富强、进步、开放等西方文化的意义,成为人们崇尚西方文化的一种符号,与近代社会一直延续的崇尚西方文化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心理相辅相成。

4 结语

晚清中国由于开口通商口岸的增加,机制洋布在中国日渐流行,越来越多的人购买穿用,着洋布衣也成为流行于全国各地的新风气,这种波及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穿衣方式的形成,改变了以往延续了千百年的中国传统衣着布料结构和老百姓的衣着习俗。同时洋布在国内的销售,也使传统中国服饰彰显礼仪等级秩序的这一特征弱化,由洋布衣的发展而不断凸显出的社会中产阶层在社会中以一种新的身份象征逐渐体现。同时,洋布使用带来的服饰用品的时尚化消费,促进了市场化的扩展,由通商口岸到内地城市、城市到乡村,呈阶梯式发展。清末民初以后,洋布用品的市场化已经由城市而日渐普及内地乡村。虽然乡村里一般中下层农民日常服饰仍然以自制自用手工土制品为主,但是稍得温饱之家,总会有一两件从市场购买的洋布服饰用品,如袜、帽、巾等,至民国以后,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城镇居民及农村上层人们的服饰日用品,日益从自给自足而转向去市场购买,洋布带动起来的服饰消费与工业生产和商业市场相连,标志着中国人的服饰方式开始步入市场化消费时代,人们延续了千百年的服饰方式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服饰面貌也因此大为改观。

参考文献:

- [1]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269.
ZHANG Guo-hui.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and China's Modern Enterprise[M].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79:269.
- [2]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M].北京:中华书局,1962:1361.

- YAO Xian-gao.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Modern China's Foreign Trade (1840 ~ 1895) [M]. Beijing: Zhonghua Book, 1962:1361.
- [3]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80.
- WANG Jing-yu. Western Capitalist Economic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in the 19th century[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3:80.
- [4]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 2014:715.
- XIA Dong-yuan. ZHENG Guan-ying's Collection of Essays[M]. Beijing: Zhonghua Company, 2014:715.
- [5]编者.广西《贵县志》(1935年本)[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1:1070.
- Anonymity. Local Record of Gui County of Guangxi (1935)[M]. Beijing: Beijing Library Press, 1991:1070.
- [6]李长莉.洋布衣在晚清的流行及社会文化意义[J].河北学刊, 2005(3):32.
- LI Chang-li. The Popularity of the Cloth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Social Cultural Significance[J]. Journal of hebei, 2005(3):32.

(责任编辑:李强)